

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苏
省
辛
亥
年

国运十字路口 的知识分子们

姚传德 著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做选择题，知识分子们饱读诗书，但是在清末民初这一国运的十字路口，究竟是选择保皇还是立宪、选择改良或者革命，这是一个问题。激进的革命者名垂青史，而纵是饱学的硕儒有时也会勾错选项。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九江学院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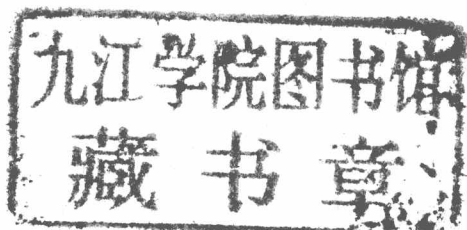
1497009

1501337

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

姚传德 著

7693.71 / 51902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不外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 / 姚传德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8
(苏省辛亥年 / 王鸿声主编)
ISBN 978-7-81137-789-7

I. ①国… II. ①姚…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5541 号

书 名: 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

著 者: 姚传德

策 划: 刘 海 李志杰

责任编辑: 周建国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出 版 人: 张建初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mail : Liuwang@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67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789-7

定 价: 37.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蘇省辛亥年

修福堂



“苏省辛亥年丛书”编辑委员会

丛书顾问 周向群

主 编 王鸿声

副 主 编 周 秦 章念翔 嵇永宁 徐 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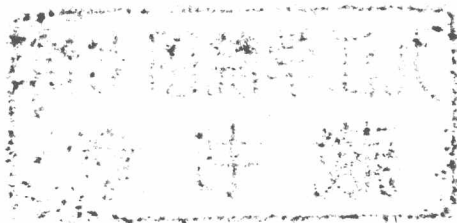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玉萍 王玉贵 王骅书 朱 玲 许冠亭

刘 海 汤进红 李天戟 陆庆和 金 遥

姚传德 陶勇杰 黄任洲

执行编委 朱 玲 刘 海



序

在中国有史书记载的 5000 年历史中,如果从秦始皇称帝时算起,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大概是 2300 年,占了约五分之二的时间段。历朝历代屡有变动的是皇帝的姓氏,而稳定不变的是帝制。皇帝被尊为“天子”,是接受了神授来治理国家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即使是以“维新变法”为号召的康梁也没有一丝一毫质疑帝制的想法,他们所有改良思想的前提是维护“帝制”不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推翻帝制”口号不啻是一声惊雷,惊醒了世人,推翻帝制、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这一理念为人们展示了未来中国的美好前景,成为先辈矢志革命的动力。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下酝酿发生的。

晚清的江苏(当时简称苏省,下辖苏州、松江、江宁、镇江、扬州等八府三州一厅)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正因为此,它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性事件中也有其独特性。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回顾苏省辛亥革命的历史,从中探寻先辈思想上的先进性和对历史进步作出的贡献,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民革苏州市委策划出版了《苏省辛亥年》丛书。该丛书有四个分册——《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绅商也要革命》、《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分别从政府的上层管理者、知识分子、绅商三个社会层面的活动以及辛亥前后社会风貌的巨大变化来反映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动因,揭示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同时又结合苏省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特质展现苏省在辛亥革

命中的个性表现,凸显苏省在全国众多省份中参与辛亥革命的独特性。

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汲取到精神的力量,苏省辛亥革命参与者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至少两样精神财富:

第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辛亥革命发生的时代背景可谓是众所周知,多灾多难是1840年之后所有国人共同经历的伤痛,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和新崛起的绅商阶层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挺身而出,做着多种拯救中国于危亡的努力。在愚昧而自大的清廷统治下,这种种努力显得尤为悲壮,戊戌六君子、孙中山、章太炎、林觉民、包括苏州的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南社成员,以及张謇、曾铸、李云书、沈缙云等绅商都殚精竭虑,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奔走呼号,各个阶层都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努力并非出于一己之私利,而是代表了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是为了“保国存种”,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在中国走向富强的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二,以民为本、审时度势的理性选择。和辛亥首义地武汉的革命完全不同的,苏省参与光复革命的社会阶层涵盖了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联的绅商、思想文化方面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三个层面。苏省作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份,封建统治力量相对比较稳固,但民众和绅商放弃对清廷的幻想,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宣示苏省的光复,迎来了苏省的新时代。此后发生的无锡、常州和镇江、扬州等地的光复行动都以较小的牺牲而取得胜利。就连军事重镇南京也没有发生惨烈的战事,就达成了光复。可以说,全国各省份在辛亥革命中的损失以苏省为最小,民众的生活未曾受到太大的影响,地方经济也未曾受到重大的摧毁,这为苏省进入民国时代后能够继续保持原先的优势独占全国鳌头打下了有力的基础。这当然应该归功于苏省光复参与者的理性选择。比如位居高层的程德全,他本是清廷的一位重臣,也是一名忠臣,他从坚定的立宪派转为革命的支持者,其主因在于把安定和民生放在了首位。绅商在这一时期的诸多表现也是基于理性的选择,他们在与外国驻华公使的斗争中一直

是采取有理有节的态度,不卑不亢,在光复革命中也采取了以最小的牺牲达到革命目的的策略。从程德全到绅商群体,他们原本并非革命党人,可最终却选择了革命一途,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理性的考量,这样的思维方式和选择技术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知古鉴今,如果这套丛书能够使今人从中汲取到先辈独具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的力量,也就不枉策划者和作者的一番爬梳功夫了。

郑平

2011年7月18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动荡、变革的年代	3
第一节 《辛丑条约》后残破的中国	4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与中国社会的变化	11
第三节 军阀混战时期	53
第四节 在现代化洪流中的知识分子	55
第二章 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活动	59
第一节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61
第二节 学者革命家章太炎	76
第三节 革命家兼教育家蔡元培	91
第四节 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汤国梨	101
第五节 知识分子的觉醒	112
第六节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教训	117
第三章 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救国活动	119
第一节 君主立宪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	122
第二节 立宪派大将、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	131
第三节 君主立宪派的思想家严复	144
第四节 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实业家张謇	153



第四章 保守型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	169
第一节 国学大师王国维	170
第二节 国学大师、保守人士刘师培	176
第三节 一代“怪杰”辜鸿铭	184
第四节 保守型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评析	192
第五章 激进派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195
第一节 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	197
第二节 激进文学家鲁迅	213
第三节 其他激进派知识分子以及其活动的评价	222
第六章 其他派别的知识分子	229
第一节 以清廷官僚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势力	229
第二节 主张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	231
第三节 宣扬国粹主义的知识分子	234
第四节 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	237
第七章 苏南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	239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苏南社会	239
第二节 苏南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	244
结 语	275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后 记	284



引言

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对中国来说可谓风雷激荡,多灾多难。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自地理大发现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现代化。尽管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欧洲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现代社会的原则主导了一切。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殖民主义以更大更猛的势头向全世界后进地区推进。所有的后进地区与民族要想不沦为殖民地,就必须改弦更张,走现代化之路。但是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是很晚的事情,也为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工业革命前的早期殖民主义时代,当亚非拉广大地区纷纷沦为殖民地的时候,东亚儒家文化圈依旧屹立不倒,保持了自己的文明独立性。但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生产能力比以前的农业社会有了成千上万倍的提高;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廉洁、有效以及对国家的动员能力都远非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治所能比拟。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之后,庞大而落后的中国就成为西方殖民者亟待打开的市场。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实质是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之间的碰撞。可惜这次惨败并没有使广大国人认识到工业文明的优点,虽然在战后初期出现了几个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炮声的逐渐沉寂,“师夷之长”的呼吁渐渐为人们忘却。在中国继续固步自封之际,西方世界却在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地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终于使部分满清权贵痛心疾首,再加上对西方文明有一定

认识的上层汉族官僚的加入,清廷内部出现了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自强的“洋务派”,至此,中国方才启动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当时唯我独尊的反现代化派仍然把持着朝政,百般阻挠现代化活动,致使李鸿章等人推行的现代化活动收效甚微。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败给了因为积极推行现代化政策而迅速强大的日本,国际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中国社会才真正感受到国家的贫弱,感受到民族生存的危机,国内终于发起了以现代化为目的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反现代化势力仍然把持着清廷的权力中枢,再加上改良派的一些策略错误,“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顽固势力也被消灭殆尽。1901年,清廷通过“新政”大力推进现代化。可结果怎么样呢?“新政”在1905年以前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06年后,由于国人认为立宪是强国之本,只有从速立宪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因而清廷又开始了立宪工作。但是这时的中国并不具备民主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条件,再加上满清权贵贪恋权位,立宪变成了毁灭清廷权威的闹剧。最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的统治在数月间便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派根本没有控制国家的实力,最后不得不将无数志士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窃国大盗袁世凯。利欲熏心的袁世凯开历史倒车,搞起了洪宪帝制,结果在一片骂声中死去,中国转而陷入军阀割据的境地,战火连年,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此时全国规模的什么现代化、民主化都无从谈起了,中国现代化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这时又有一股思潮兴起,他们认为中国不能现代化、不能建立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帝制时代,必须来一次思想革命,打倒为专制服务的孔孟之道,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

本文试图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各个流派知识分子思想与活动的解析,探究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



第一章 动荡、变革的年代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积累的危机达到了顶峰。从外部环境看,尽管因为列强之间相互牵制,瓜分中国的危机暂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近邻俄罗斯、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仍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从国内情况看,《辛丑条约》签订带来的巨额赔款导致清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清政府拼命搜刮民财,使饥寒交迫的民众忍无可忍,各地一再爆发抗捐抗税的群众斗争以及抢米风潮。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帝国主义以及传统势力的压迫,生存艰难。为了挽救并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终于放弃了以往妄自尊大的立场,在某些方面承认西方的先进,开始实行向西方学习、促进现代化的“新政”。“新政”的展开、科举的废除以及留学生的大量派遣,使得晚清朝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可惜由于清廷的腐朽以及权威的丧失,再加上改革的失误,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一部分觉醒了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从事各种方式的救国活动,于是,改良势力、革命势



签订《辛丑条约》

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思潮一时蜂起,影响乃至左右了20世纪中国的发展。

第一节 《辛丑条约》后残破的中国

一、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民族生存危机

由于顽固派妄自尊大,一再阻挠现代化改革,中国屡屡失去发展的机遇,国际生存局面越来越严峻。鸦片战争之际,中国尽管败给英国,被迫割让香港、五口通商、给予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等,但当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保持世界第一,而且鸦片战争后的很长时间内,在贸易上中国仍然维持着出超的地位。所以,应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依然维持着一个封闭的体系,虽然主权受到损害,但仍然不失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由于清政府并没有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点,所以,尽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编写了《四洲志》、《海国图志》以及《瀛寰志略》,提出了“师夷之长”的口号,但是,整个中国依旧大梦未醒,沉醉在唯我独尊的梦幻之中,没有普遍形成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的意愿。其结果是,中国浪费了鸦片战争之后20年的宝贵时光。在这20年里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尚不太大,但是,在这20年里日本正酝酿着急剧的变革。日本人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失败原因,很快就认识到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优势,如果不奋起直追、不致力于现代化,必然国破族亡。于是,西学在日本风行一时,在中国无人问津的《海国图志》等书,在日本成为畅销书,供不应求,明治维新已经呼之欲出。

1856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列强势力一再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在屡不获准的情况下,英国遂借口“亚罗”号事件,寻衅向中国开战,由此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遭遇英法联军的前空巨创。这场战争迫使清廷政府内部一部分官僚开始主张在一定限度内师夷之长;再加上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部分汉族官僚因接触西方文明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他们也积极地主张学习西方。这两类势

力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洋务派”,正是他们开始了中国初步的现代化活动。但是,由于反现代化势力仍然把持着中国的朝政,所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主持的现代化活动受到百般阻挠,收效甚微。仅就修铁路而论,从开始提议到修建就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而日本1868年开展明治维新后,全力以赴地殖产兴业,普及现代教育,展开地方自治。到1889年就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基本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工作,前后总共不过21年的时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这场战争使中国的虚弱完完全全地暴露在世界面前。一时间,列强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抢占各种权益,国际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四境告急。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发起了改良运动,希望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现代化之路。在他们的努力下,1898年6月,终于展开了戊戌变法。但是,由于顽固派仍然把持朝政,同时也由于康有为等人某些变法措施的失当,激化了守旧势力与改革势力的矛盾,最后,“百日维新”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血腥镇压。

戊戌政变后,遭受重挫的改革势力噤若寒蝉,而顽固势力则甚嚣尘上,猖獗一时。在镇压了国内主张现代化的势力之后,顽固势力又幻想依靠义和团驱逐外国侵略势力。他们仇视一切现代事物,怂恿老百姓扒掉好不容易兴修起来的铁路,割断标志中国有现代气息的电线,在己方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不顾后果地采取偏激的暴力行为,烧毁洋人的教堂,迫害西洋传教士。外国侵略势力借机疯狂报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强行占领天津、北京,无恶不



洋教士在中国乡间传教

作,而被顽固派寄予厚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却无与列强对抗的军事实力,真正进行像样抵抗的只有清朝的政府军。庚子之乱后,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逼使清廷赔款白银 4.5 亿两,以关税、盐税、常关税做担保,分 39 年偿清,加年息 4 厘;在北京设立使馆区,天津至北京沿线不再设防等等。《辛丑条约》极大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让清政府的财政几乎破产,而外国侵略势力却声称这个条约以及赔款数额还是很“仁慈”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生存形势更加严峻。各国军队在条约签订后如约陆续撤离中国,但俄罗斯的军队却赖在东北,拒不撤退。不仅如此,还变本加厉将它的远东总督府设到了中国的领土——旅顺,其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俄国的这一野心,与同样抱有侵略中国野心的日本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自从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本便制订了对俄作战计划,在国内打出了“卧薪尝胆”的旗号,疯狂地扩张海陆军备,积极准备对俄一战。而英、美等国对于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企图也非常不满,其中,英国同俄国在中东、近东等地都存在矛盾。为了有效扼制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英国不惜放弃严守多年的“光荣孤立”政策,于 1904 年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因为矛盾不可调和,1904 年爆发了日俄战争,但陆战的主战场却在中国境内,东北民众因为这两个强盗的相互争斗而生灵涂炭,倾家荡产,纵横千里,几同赤地。由于日军处心积虑,准备充分,军事组织先进,俄军连战连败,战局日趋不利。1905 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无法继续战争,而日本虽然连续取得胜利,但也损失巨大,筋疲力尽。最后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签订了和约,约定双方同时撤退在中国东北的军队,俄国将长春以南的铁路与相关权益以及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大连湾“转让”给日本。后来,双方还划定了在中国东北以及内、外蒙古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英国在 1904 年连续出兵入侵我西藏,并曾一度占领拉萨,在随后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虽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却掠取了许多权益,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1904 年,德国派出海军深入长江,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洞庭湖、鄱阳湖一

带的无理要求;英国政府趁火打劫,立即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舟山群岛。德、英两国的舰队云集中国的长江流域,法、美等国也纷纷准备派遣军舰进入长江。一时间剑拔弩张,局势非常紧张。后来由于列强之间各自利益互相牵制,无法达成共识,直到日俄战争结束,此次瓜分危机才告缓和。

尽管因为列强间的矛盾,瓜分没有成为事实,但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受到了列强的干预,他们甚至插手中国地方官的任命。在帝国主义的淫威面前,清政府无不俯首贴耳,以至于被讥讽为“洋人的朝廷”。

在经济方面,1902年到1903年,英、美、日三国先后同清政府签订新的《通商航行条约》。根据新约,通商口岸由1899年的45个,增加到1911年的82个,租界扩大到了中国的16个城市。通商口岸的外国商行由1901年的1102家增加到1912年的2328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全部由其左右。1900年,中国外贸入超为白银5000多万两,1906年则急剧增加到1.7亿多两。

在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适当引进外资可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其带来缺乏的资金、技术、管理方式以及世界市场等。但此时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作用则大不相同,这些外国资本的进入虽然在客观上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更要看到此时的外资却又配合列强的政治入侵,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控制是其主要动机。日本的《朝日新闻》曾经露骨地阐明了铁路在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的作用:“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其他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掌握铁路权是“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之使不知其分”^①的绝妙办法。所以,当时的列强竞相在中国修筑铁路,力争控制所修铁路并取得铁路沿线的利益。到1911年,在中国已经修成的铁路中,外资控制达93.1%。

^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684页。